

迎接西农解放回忆录

周志尧

邹雅林
马振尧
周尧

合著

I 251

21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

前 言

历史是沙漠上的脚印,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风暴的冲刷而逐渐淡化而消失,只有在特殊环境中、在生死斗争中所建立的友谊,将永远珍藏在战友彼此的心中。

我珍摄这份友谊,把它们收藏在这个小册子内。

目 录

1. 邹雅林：一代师表、千秋业绩——回忆我与老师	
周尧教授难忘的师生友谊	1
附：来信	19
2. 马 振：特殊的师生情谊	20
3. 周 尧：迎接西农解放回忆录	23
附：邹雅林同志来信	34
附：高兆宁同志回忆文章	35

一代师表 千秋业绩

——回忆我与老师周尧教授难忘的师生友谊

邹雅林

(甘肃省政府秘书长)

周尧教授是原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总务长,是我尊敬的老师。我们之间特殊的师生友谊,是在特殊的环境中为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共同战斗中建立起来的。这种珍贵的师生友谊已经伴随了我们五十多个春秋!

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和德高望重的教授,由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绩,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我是农业经济系的学生,没有直接听过周先生的讲课。但他正直的做人和严于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特别是他在西府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要强迫进入西农,他不畏强暴、不怕风险和困难,带领全校留校师生奋起护校的英勇行为是我非常敬佩和难以忘怀的。我早就想为先生可敬可佩的精神写点自己的感受,但由于我在《黎明前的战斗》一文中对周先生的功绩已有所记述,所以一直没有动笔。现在看起来,该文没有充分表达先生的为人特别是在西府战役中我与先生之间的这段共同战斗的生活,所以才决定写这篇回忆的文章。在1989年纪念周尧先生从教50周年时,我写给先生的祝辞是“一代师表,千秋业绩”,周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欢声雷动 迎接亲人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

攻之后，开始大举反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在全国各战场的整个敌我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大好形势下，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个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正如毛主席 1947 年 12 月 25 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说的：“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44 页）。全国各个战场，都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向国民党统治区挺进。西北野战军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继宜川大捷之后，又于 1948 年 4 月 12 日发动了西府（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战役，挺进泾水、渭水间的广大地区，截断西兰公路，并且在 4 月 22 日收复延安。

当时，西农地下党几乎天天组织进步学生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在教学大楼 43 号教室里每天都挤满了收听广播的学生。在收听中斗争是很激烈的：进步同学要听新华社的广播；反动的学生乘机进行捣乱，坚持要听“中央社”的广播。这样，在收听广播中明显地展开了两种立场、两条道路的斗争。每次都是在进步学生一致的反对下，他们的捣乱才算罢休。上面所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们都是在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中听到的，并且每次都能听到解放军在各大战场打胜仗的消息。进步同学听到这些消息后，都精神振奋，奔走相告。这样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就成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的重要阵地。据周

先生后来告诉我，同学们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他是知道的，而且还常有进步学生向他传递这方面的消息。反动分子为阻止进步学生收听新华社的广播破坏了大楼的广播器，是周先生三次派人修理好的。所有这些就成了他勇敢地投入护校斗争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和追求光明未来的力量。

在这样大好形势下，西农的广大同学和教师员工，在对待西府战役的两种立场、两种道路的斗争就像泾河、渭河的清、浊的两股水一样：虽同入渭河，却“泾渭分明”。我和广大进步学生一样，看到解放战争曙光在前，胜利在望，尤其是西府战役打响之后，大家精神振奋，欢声雷动，积极响应西农地下党的号召，团结一致，坚持留校，迎接解放。而少数反动学生，则如惊弓之鸟，惶恐万状，他们按照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西安反动当局的旨意，四处奔走，大肆造谣，用种种威胁手段，强迫学生东迁西安。在此紧要关头，大浪淘沙，对每个人都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当时西农的领导，在这场考验面前，是留？是走？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最后由于周先生坚持留校，由此产生意见分歧而分道扬镳！

挺身而出，和同学共患难，同西农共存亡

1948年4月，西府战役打响不久，武功县城解放。炮声传到西农，我们都站在西农教学大楼的平台上了望，盼望解放军早些到来。欢天喜地迎接解放。

4月20日是西农校庆节，照例要开庆祝会。由于西府战役开始，4月18日周尧教授通知在校庆期间不再演戏，并叫学生自治会通知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来西农参加校庆、拟作友谊比赛的球队从速离开；宣布校庆活动一切从简。其实大多数同学为迎接解放都把校庆活动放在脑后了！

当时，首先乱了阵脚的是校领导。在西府战役即将到来时，教

育部指令西农成立所谓的“应变非常委员会”，由校内组、处级以上人员和教授代表组成。该会成员有的主张将西农迁到汉中或成都，有的主张就近迁往西安，也有一些人主张迁到江南，议论纷纷，拿不定主意。事后周先生告诉我们，由于他坚决反对迁校，才没有形成决议。他认为，西农不论迁到那里，学校还是要办下去的，迁校受损失的是学校，受连累的是教师和学生。他说：“我要保存学校的完整，不管政局怎样变化，学校总是要办的，我决定留校，我要为祖国和西农保存一份元气。”

在解放武功的隆隆炮声中，学校当局和多数不明真相的学生纷纷离校跑到西安，校内只有二百多名坚持留校、迎接解放的学生、教职工和家属。学校当局组建的所谓“应变非常委员会”宣告解体，院长唐得源不在校，自然由教务长王正、训导长段兆麟和总务长周尧三人留守学校。可是，王、段二位先生看到“局势已不可收拾”，不愿担此风险和重任，四月二十二日就仓惶逃到西安去了。这天，大雨倾盆，国民党军队又强行进校，在这战火纷飞、风雨交加、国民党军队又强行驱赶留校学生到指定地方集结的关键时刻，一百多名留校师生和家属，冒雨站在行政大楼前等待校方的决定，周尧先生看到后非常激动，他站在凳子上流着眼泪大声地说：“请诸位不要惊慌，我决定留下不走，我不能丢下学校和大家一走了之，我和西农有十年的历史关系，大家都把十多年的心血倾注到学校，我们的图书、仪器和研究的成果及记录都留在学校，我不能撒手不管，我愿为学校牺牲，与学校共存亡！”周先生的讲话，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留校的师生都非常激动，情绪顿时安定了下来。

周先生这一行动，并非受命于危难之际，而是自愿地承担风险、自觉站出来维护学校的，实在难能可贵，我从内心里感到敬佩！

1985年12月10日，我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常务理事和西北五省（区）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的秘书长到西安参加该委员会1985年的年会，恰巧周先生是西北五省（区）野生动物保护委

员会的主任顾问，也来参加会议。他知道我到西安开会，就到我的住处来看我，这次见面我们都非常激动。30年前乌发美髯、朝气蓬勃的周教授，已是雪染发须的老人了！但先生仍然精神抖擞、侃侃而谈，叙述昔日往事，主要是共同回忆了我们在西府战役中的战斗生活。他说：“当时我所以自觉地站出来，愿意和西农共存亡，并非出于一时的激动，而是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认识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大势已去，必将为共产党所取代，我出于爱国、爱校、向往光明的意愿，才自觉地站出来担起护校的重任”。他在1948年5月1日的家书中，也谈到了他当时的思想情况，信中说：“国（民党）军一度侵入学校，抢劫破坏，无恶不作，可见国民党统治中国30年，每况愈下，已近穷途末路，行将崩溃。相反据说共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则深得民心，由此可见，取而代之，势所必然。”（周尧著《雕虫春秋》第50页）据此，周先生在护校中发出“愿与学校共存亡”的誓言就很可以理解了，他是出于爱国、爱校之心勇敢站出来的！

把蒋军二十八团赶出西农校门

在西府战役中，西农地下党的工作既活跃而又慎重、严密地稳步前进。目的就是既要搞好护校工作，又要保护留校师生和家属的安全。周尧先生自动挺身而出，愿与学校共存亡，这与地下党的要求和广大留校师生的愿望是一致的，所以才得到地下党的支持和留校师生的衷心拥护。年逾古稀的教语文的教授匡厚生老先生在留校学生的一次集会上说：“周尧教授不畏难险、愿与学校共存亡的行动，我非常钦佩；而经济系系主任、三青团的负责人龚道熙，贪生怕死，临危逃脱，连他年迈的母亲都丢下不管，简直是禽兽不如！”

当时，跑到西安的同学中有少数反动分子十分嚣张，他们四处奔走，大肆造谣，并向西安反动当局告发说，留校的师生“都受了共产党的蒙蔽”、“都是共产党”，“他们劫持学校，不让学生撤退”；并

且还造谣说：“周尧已被左倾分子监视，退不下来，王正、段兆麟都是逃出来的”，等等。于是西安反动当局下令要留校的师生全部撤到西安报到，否则就要派军队把他们押送到西安受审。在这种强大的压力面前，周先生没有改变留下护校的决心，继续带领师生开展护校工作。在此紧要关头，通向西安的漆水河桥被炸断，西去绛帐的铁路也被中断，才使西安反动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

西农的护校工作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从4月12日西府战役开始全面展开。公开活动都是通过《亢丁》社、《春草》社、《汨罗江》等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文艺团体和进步学生开展的。《亢丁》社的负责人马振被推举为留校的学生代表之一，全面负责留校同学和教职员管理小组的工作，并且代表群众的意见直接与周尧先生联系。据我所知，当时周尧先生对马振同志是很佩服的，对他的意见也是很尊重的。

当时护校的重点，我所知道的有四个方面：

第一，办好伙食，安置住宿，吃饱睡好，安定人心。马振同学代表留校同学教职工管理小组对应做的工作做了分工。我和宗恩泽、左凤章三人的任务是管理生活。首先是安置好50多名留校学生的吃饭问题。我们立即投入战斗，着重抓了五件事：①冒着大雨，夜以继日地干了两昼夜，将全校五个食堂的米、面、油、菜造册登记，统一管理使用；②组织留校学生集中在“战区学生食堂”用饭，既便于互通消息，又便于管理；③尽可能帮助教师、职工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④动员留校炊事员团结一致，做好饭菜，保证每天大家都能吃到三顿热饭；⑤为了使学生和教职工能吃到新鲜蔬菜，我们还动员常给各灶送菜的菜农继续送菜，并且还设法到附近村庄购买。我们把这项工作当成光荣任务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使每天的饭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些安排，我们都随时向周尧教授和马振同志汇报，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第二，保护图书仪器，保卫科研成果，确保留校学生和教职工

及家属的安全。关于图书、仪器，周先生亲自组织留校学生和有关管理部门，将重要的2档案和贵重图书、仪器装箱，送入保险库里。所有要害科室都贴有封条，并盖有学校和周先生的印章。我们都是全力以赴地跟着干的，一直到周先生满意为止。警卫工作也是周先生亲自安排的，我们和校警一起参加站岗放哨，我和左风章、宗恩泽、李鸿恩的岗位就在校墙西南角的炮楼上。

第三，严加保护学校的水源，这是全校师生的生命线，也是用以克敌制胜的关键。西农的校址在杨陵镇张家岗上，全校只有一口机井，用抽水机昼夜不停地抽水，才能保证全校师生员工的用水，一旦遭到破坏，吃水就成了严重问题。地下党把这任务交给了西农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英杰同志。王英杰于1940年从延安马列学校到国民党统治区做工运工作，1944年从西安大华纱厂转到西农，以电器工人作掩护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在西府战役中，党交给王英杰的任务是，保证留校学生和教职工的吃水问题；如敌人进校，伺机秘密拆藏抽水机零件，切断敌人用水，使敌人不战自溃。当时王英杰就借住在周尧先生多余的一间厨房里，和周先生很友好，周先生虽不知道王英杰的身份，但有事却能找他一起商量。

第四，千方百计不许国民党军队进驻学校，保卫留校学生和教职工的安全。

总之，西农的护校工作，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紧张、迅速而又井然有序地进行。周先生更是信心百倍地投入护校斗争。

可是4月22日，国民党的军队飞扬跋扈地闯进了西农。不知是哪个部队，只说是“二十八团”。这个团据说是在陕北打了败仗退下来的。这些败军部卒，在战场上损兵折将，狼狈不堪；特别是在解放瓦子街和宜川大捷中，解放军消灭敌军五个旅共三万余人，击毙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等人，敌人已溃不成军。但这群败军之徒，对待老百姓和学生却大抖“威风”，出言恶口伤人，行如饿狼捕食，穷凶极恶，为所欲为。他们一进校门就吼叫“这里要打仗了，教学大楼

要成为炮楼”。他们在教学大楼到处凿洞作为炮眼，在校园随便挖战壕构筑阵地；他们封闭教学大楼，不准留校师生出入；拆除校内电话总机，断绝师生与校外联系；并且强迫驱赶留校师生集中在院内西南角教授住宅区软禁起来，不许随便走动；更有甚者，他们到学生宿舍，撬窗砸门，翻箱倒柜，偷盗东西。全校顿时充满白色恐怖，到处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

面对这群荷枪实弹、穷凶极恶的匪徒，周尧先生当即约了邵敬勋和宋树藩两位老师一起再次和二十八团团团长严辞交涉，要他们整顿军纪，退出学校，并告诉他说：“我是西农的总务长，负责西农的留守工作。西农是高等学府，不能进驻军队，不能毁坏公物和乱抢学生的东西”。这位团长听了以后暴跳如雷地说：“是我们的性命重要，还是大楼、校园重要？我们士兵是不会抢人的，你指出来是那一个人抢了学生的东西？”周先生听了非常生气，一拍桌子，拿起桌上的电话听筒就大声说：“请接胡宗南司令官！”这位团长立即从周先生手里夺过电话听筒，态度顿时软了下来，他说：“有什么事可以坐下来谈，不必动火嘛！”经过一番争论与商量，终于达成了三点协议：一是答应整顿军纪；二是允许抢救学校图书仪器；三是所有公私房间门窗都要贴封条，每个封条都有“周尧封”的字样，没有得到周先生同意，任何人不得随意启封。达成协议后，学校的图书、仪器才得以顺利地转移到校内的防空洞里。我和留校的同学大都参加了搬运图书、仪器的活动。这一活动，既完整地保护了图书、仪器，实现了周先生的心愿，也是留校师生为了开展护校工作最有力的证明。邵敬勋是我们经济系的教授，他曾对我说：“周尧先生面对国民党军队，正气凛然，慷慨陈词，迫使敌人不得不坐下来商量，佩服！佩服！”

1986年，我在西安又与周尧先生谈及在护校中赶走28团一事，称赞他的勇敢与机智，他谦虚地说：“赶28团，王英杰同志立了第一功。”接着他叙述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他说：“王英杰同志是

西农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我当时毫无所知。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是：叫他保证西农留校学生和教职工的用水；但如果遇到敌军闯进西农、阻挡我军前进时，要秘密地、及时地拆毁抽水机，切断敌军用水，逼走敌军，配合解放军作战。”这些周先生事前虽然不知道，然而由于王英杰借住在周先生家中多余的一间厨房里，天天见面，相处友好，所以当周先生找王英杰同志商量如何赶走 28 团时，他二人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心领神会地都笑了。周先生回忆此事时说：“当时对 28 团的所作所为，我受不了这口气，如何把 28 团的人赶出去？我就找王英杰商量，我说看来得从你处想办法。他心照不宣地笑了。不一会他到机房秘密地把抽水机拆了，把机器上的心脏零件（一根 25cm 的铁轴）拿来，从我家中取了两张油纸，把它包好，埋在我家的菜园中，我通知各家各户蓄水，然后让他把蓄水池水全部放完。”（引自周尧著《雕虫春秋》“政治篇”第 37 页）。周先生和王英杰配合如此默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对地下党的这一秘密行动，我一无所知。马振同志只是告诉我们全力以赴抓好留校学生的生活，涉及要校方解决的问题找周尧先生商量。所以接到周先生要储备用水的通知后，我和左凤章、宗恩泽、李鸿恩等同志分头通知各灶想尽一切办法多储些水，以防不测。各灶储满了水，抽水机就停了，水塔、水池的水流光了！

当时正值炎热的 6 月，没有水，就无法生活。28 团团长就威逼王英杰抢修，王说“机心”已坏，没有零件，无法修理。敌人就把枪口对准王英杰说：“你修不好，就枪毙你！”王英杰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机器零件，就是打死我也修不成！”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因为无法解决吃水问题，28 团只好夹着尾巴滚出了西农！周尧先生谈起在西府战役中，因护校“拆机断流，赶走敌军”一事，得到地下党的支持和王英杰同志的信任而感到自豪！

护卫周尧老师“单刀赴会”

二十八团撤离西农后，虽然周尧先生带领留校学生、教职工继续往防空洞搬运图书、仪器，打扫教学大楼，清理战壕、掩体，但校内仍然没有平静下来。

随着漆水河桥的修复，西安到武功的火车通车，西安反动当局的威胁亦随之更加紧迫。一些特务分子还扬言：“留校学生已经赤化，要到西农抓共产党”！这时情况十分复杂，形势变化多端，校内仍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曾多次通过马振、朱象三等同志向党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坚决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决不去西安”！马振同志鼓励我们坚持斗争，并告诉我们：“曙光在前，离胜利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周尧教授责任重，困难多，有事可直接找他商量”。

经过同二十八团的周旋和斗争，周尧先生进一步得到广大留校学生、教职工、家属的信任和拥护。他热情很高，信心很足，二十八团一撤走，他就命令校警走上岗位，并在学校南门架上机关枪，决定“今后拒绝国民党军队进驻学校。”他自己还佩带手枪亲自在校内检查岗哨，满怀豪情地迎接解放。

我们原以为解放军会很快解放西农，结果解放军攻下武功后并没有进西农，而是沿着北原向西挺进了。后来才知道，解放军这时是去占领平凉，截断胡宗南和马步芳之间的联系，以便分别歼灭；王震司令员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宝鸡，破坏了胡宗南的总兵站基地，为以后解放关中、缩短西北战争的进程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西农的形势又突然紧张起来。二十三日下午，一方面是逃到西安的人来电话，命令留校的人立即全部撤到西安，被周尧先生断然拒绝；另一方面又来了一大批国民党军队要进驻学校，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整编第一师，不久前在陕北打了败仗后撤回的，师长名叫罗列。这位从陕北战场溃退下来的败军之将，被打掉了昔日的气焰，带领大队人马，先从西农东西两侧包围

起来,却没有马上闯进学校。这时周尧先生叫发出警报;加强警卫,并把每个岗位增加一位先生和两位同学;然后将留校部分同学集合在教学大楼前,郑重地向大家宣布:“请大家听我们的指挥,不论来的是国民党的那一部分军队,我们都不能先开枪。否则西农就会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学校就会毁于一旦!如果他们一定要进来,先问明番号,然后让他们派人来和我接洽”。

这时,罗列要带兵进校,被守门的警卫和同学挡住,告诉他们:“要进校必须经过学校负责人的许可。”这时我从炮楼上下来跑到了现场,只听到这位国民党军官:“嘿嘿!这时候还有负责人,好哇!那就请出来讲话吧。”同学们把情况告诉周先生后,他二话没说,就紧握腰间佩带的手枪,快步来到现场,我和陈绍曾、王树权(现均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立即跟随在周尧教授的左右,保护周先生,决不允许国民党军队进校。并且告诉他说:“这是西农的总务长周尧教授,他是留校师生的总负责人。”这位国民党军官自我介绍说:“我是整编第一师师长罗列。”周尧教授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不懂得政治和军事,但我有决心保护学校。请你站住,不准再前进一步,否则不是你流血就是我流血,士可杀不可辱!”这位罗列师长对周先生连连表示敬佩,并且说:他是“奉命”来“保护”学校的,只准备进驻师部,大约100人。当时周先生和我们几个在他身边的人及校门内的同学立即进行紧急商量,都认为只进驻师部的一百人是可以的,但要有条件,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周先生和他们谈判的结果:第一,这一百人只能进教学大楼第一层(不能进财务科和图书馆);第二,学校大门和围墙上的岗哨,既有他们的士兵,也要有我们留校的同学和校警;第三,师生员工可以自由出入大楼和校门。达成协议后,他们只进驻师部的一百人。以后,同学们忆及周先生同罗列谈判之事,被誉为“周尧教授单刀赴会”。用以称赞周先生胸有成竹、无所畏惧的气概,大有蜀汉关羽应鲁肃之约“单刀赴会”的遗风。周先生对此事念念不忘,我们也以能

护卫先生“单刀赴会”而感到自豪！

可是，周先生佩带手枪和罗列谈判一事，却在极少数留校学生中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周先生是个学者，那里来的手枪”？“他的政治面目和对解放战争的态度如何”？似乎都不清楚。因此主张“在政治上争取他、团结他，在护校工作中拥护他、支持他，尽可能的完成他交给的任务。但同时要提高警惕：听其言而观其行”。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思想单纯，阅历也浅，只凭一颗爱国、爱校的赤子之心，追求真理，迎接解放，满腔热情地参加护校斗争。对自己是这样，看待周先生也是这样。当我听到上述议论后，曾同左凤章、宗恩泽、李鸿恩等同学多次进行过商量，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周先生虽然佩带手枪，但把枪口是对向国民党的军队，不是对向学生，他的行为是爱国爱校的；据说他 1938 年从意大利留学归国，投笔从戎，参加抗口战争，并且亲赴前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和日本侵略军作过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军人身边留一支自卫手枪是常见的事，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他把枪口对向了国军党军队。

第二，周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并非受命于危难之际，而是自觉拯救西农于危难之中。当时，他完全可以和王正、段兆麟一样逃往西安，万事大吉。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义愤填膺，振臂高呼：“愿与学校共存亡”！这样做，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第三，我们亲眼看到，他在护校斗争中，设法赶走 28 团；他和罗列义正辞严地进行谈判时，我就在现场，没有看到周先生有丝毫奴颜婢膝的样子，而是单枪匹马，拒罗列于校门之外，不许罗列及其所部再前进一步，否则“不是你流血，就是我流血，士可杀不可辱”，表现了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

我当时为周先生义正辞严、不畏强暴的精神所感动。既未发现有任何可疑之处，也没有为护卫先生“单刀赴会”的正确行动而动摇过。先生交给我的任务，我同左凤章、宗恩泽、李鸿恩等都是尽力

去完成的。正如周先生所说：“由于我们在西府战役中患难与共的生活，我们都已心心相印了”。

现在看了周先生所著《雕虫春秋》后，得知先生确实于1938年满腔热血回国抗日；并在《胸中分泾渭》一文中知道先生于1942年被骗加入国民党、1944年声明退出国民党的经过，1947年6月8日又写出《重申退出国民党、三青团的公开信》，并在西农教学大楼内的布告牌上公开张贴，张贴后立即被人撕去。他说：“当时不知揭者何人？如为‘国方’，则今后不敢再盗用我的名义以欺骗青年；如为‘另方’，亦可证明我的心迹”！（《雕虫春秋——政治篇》第23页）。当时正处在我地下党领导的“反饥饿、反迫害”的高潮；全国各个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的形势下，周先生重申退出国民党的声明，其勇气实在令人钦佩！周先生在1938年从意大利《回国抗日》一文中写下了一篇表达自己抗日救国壮志的诗：“当哭狂歌志气高，不驱倭奴岂英豪；海天一击中流楫，投笔书生着战袍。”在发出的《重申退出国民党、三青团的公开信》后面也附了一首诗，以示自己的心愿，诗曰：“葛禄万钟无令闻，躬耕莘野多古芬。劝君莫话封侯事，富贵于我如浮云。”这些就是他敢于“单刀赴会”的思想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的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是的，当时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回国抗日》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看到、听到他《重申退出国民党、三青团的公开信》，但是我们在“六·二”罢课中没有见周先生持反对意见；在西府战役护校斗争中他站在留校教师的最前列；是他第一个高呼“愿与学校共存亡”的誓言，是他为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校勇敢地去“单刀赴会”，这就是我们当时信任周先生的根据，也是我敢于护卫先生“单刀赴会”的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西农地下党对周先生的言行和政治态

度是了如指掌的。否则西农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英杰是不会同周先生商量“拆机断水，逼走 28 团”这样机密大事的，更不会将拆下的抽水机的零件秘密地埋藏在周先生的菜园里。这充分说明地下党组织对周先生是信任的。

“王者之师”众人夸 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西府战役中，解放军切断西兰公路，挺进宝鸡破坏了胡宗南的总兵站基地后，由于大决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即挥兵主动撤离西府一线，加紧休整，为西北战场在以后的扶眉战役中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接着国民党军队也撤出西农。

但是，这时西农校内的形势仍未平静下来。特别是随着漆水河桥的修复，西安到武功的火车通车；西安的反动势力迅速向西农扑来，威胁亦随之更加紧迫。他们一方面命令留校人员全部撤到西安，被周尧先生断然拒绝，明确地告诉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你们逃跑了，我和留校同学保护学校和图书、仪器，现在学校最困难的时期虽然过去了，但形势未定，我们不能离开学校，不能让保留下的图书、仪器再遭到破坏！”另一方面特务分子更加嚣张，扬言：“留校学生都赤化了，要到西农抓共产党”！这时学校完全处于国民党势力的控制之下，情况十分复杂，形势变化多端。如果不是周先生坚定的留校，不但会使学校受到损失，而且留校进步学生也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在此关键时刻，周先生再次向留校学生表示：“我不问大家的个人信仰，几天来的事实证明，大家都是爱国的，都是好青年。我坚决不去西安，愿意继续同大家共患难。万一那位同学因此被军警逮捕，我愿意陪他去坐牢！”这些铁骨铮铮的声音，进一步坚定了留校进步学生同国民党斗争的信心。

周先生所以如此坚定，是由于先生在这次战争中对共产党、解放军有了进一步认识。当时，我们这些外出采购蔬菜的学生，听到菜农说了许多关于“解放军秋毫无犯，军纪严明”的事，都如实地告